

墨西哥专题

# 墨美关系与现代墨西哥国家的形成

姜 阳

**内容提要：**1808—1867年的墨美关系从领土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展开。在领土方面，美国的扩张运动多次重塑了两国边界。通过得克萨斯战争和墨美战争，美国占领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严重破坏了墨西哥的领土完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首位驻墨西哥公使波因塞特在墨西哥支持约克礼式会，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墨西哥自由派。在墨西哥三年内战和反法战争期间，美国在“捍卫新大陆联邦共和制、抵御旧大陆君主国入侵”的口号下，以军事援助和外交声援的方式支持墨西哥胡亚雷斯政府，协助墨西哥自由派战胜了保守派，推翻了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总体来看，1867年前的墨美关系既包含了“以领土换保护”等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又囊括了盎格鲁清教文明征服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以“美国模式”对抗君主制等文化层面。不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意识形态输出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主要为其领土扩张的现实主义目标服务。由于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抵御外部强权干预和维护国家主权，这与美国普适性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相抵触，也深刻影响了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在现实利益方面的合作。

**关键词：**墨美关系 自由派 现代国家 利益交换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姜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拉丁美洲史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124；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4)02-0090-19

在 19 世纪现代墨西哥国家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影响既像利刃切割牛排一般整齐地割走墨西哥北方的大片领土，又如强盾一般与墨西哥本土自由派一同对抗旧大陆的侵袭，保护了墨西哥的自由共和体制。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墨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兼具利益交换的现实特征和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化特征。在现实层面，墨美双方政府签订的各个条约都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扩大本国或本派系或统治者本人在领土、商贸、权力等多方面的利益。在意识形态层面，作为盎格鲁清教文明代表的美国和作为西语天主教文明代表的墨西哥之间具有信仰上的深层隔阂。然而，同作为欧洲在新大陆殖民地的相似经历，且独立后都采用以启蒙思想为基石的联邦共和体制，为两国在地缘政治上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增添了合作对抗“落后的”君主主义旧大陆的理由。

本文在国际政治范畴下，将国家行为体作为历史分析的主要单位，重点分析墨西哥和美国官方层面的关系，研究时段界定在 1808—1867 年之间。因此，本文主要运用两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外交官日记以及时人回忆录等史料，在经典的国家研究框架下分析一些重要人物和团体在墨美关系和墨西哥国家建设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这段时期墨美关系的考察不仅聚焦在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同时也关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文化层面。扩张主义与自由共和的“美国模式”成为美国对墨西哥寻求领土扩张时的意识形态的一体两面。本文的具体内容包括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墨美边界冲突以及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

## 一 墨美关系相关研究的回顾

在 19 世纪的墨西哥对外关系史中，墨西哥与北方近邻美国的关系是最复杂的。如果说墨西哥共和国早期与西班牙的关系是前殖民地与前宗主国之间剪不断的纠葛，与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共和国之间是未完成的结盟，那么，与美国的关系则无法一言以蔽之。墨美关系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在墨西哥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正如佐拉达（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所言，“墨西哥历史学传统上侧重于墨美关系，这无疑是最根本的关系”<sup>①</sup>。

<sup>①</sup>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México y el Mundo: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Tomo II: México, Gran Bretaña y Otros Países (1821-1848)*,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90, p. 111.

如今，墨西哥史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以“官方视野”与“民间视野”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墨美关系。富恩特斯（José Fuente Mares）的《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sup>①</sup>一书基于1810—1822年间的报刊史料，研究当时美国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民间对美国扩张的看法。此外，与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转向<sup>②</sup>类似，墨西哥对外关系史学家的新近研究也注重从区域和国际的视野来讨论墨西哥对外关系史，将墨美关系放入更大的情境中来考察。例如，埃雷拉（Octavio Herrera）的《墨西哥国际关系史：北美卷（1821—2011年）》<sup>③</sup>一书从国际环境来考察墨西哥对外关系史，并将墨西哥的对外关系分为双边、多边、次区域和区域等多个层次。此书与其他外交史著作相比，更加注重从北美区域和国际视角下分析墨美关系，看到英法等欧洲势力在其中的影响。

此外，墨西哥史学家也较早开始从文化角度进行思考。富恩特斯的《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美国扩张中的作用，认为加尔文清教传统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文化起源。他通过盎格鲁清教文明与西语天主教文明二元对立的叙事来解释美国的扩张主义起源。<sup>④</sup>佐拉达编撰的《墨西哥与世界：对外关系史》系列中有关墨美关系的部分，也采用了富恩特斯的两种对立文明的冲突叙事，强调墨美冲突是殖民末期美国与西班牙冲突的延续。<sup>⑤</sup>富恩特斯在他另一部著作《胡亚雷斯与美国》<sup>⑥</sup>中提到，墨西哥自由主义者在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理想的驱使下促成了自由派政府与美国合作，并最终捍卫了墨西哥改革的果实。由此可见，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墨美关系有利于理解两国之间潜藏在外交政策和条约之下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联系。

1808年前后，由于拿破仑对西班牙本土的攻占，西班牙波旁王朝在美洲的统治濒临终结，西属美洲殖民地相继爆发独立运动，与此同时美国则借欧陆动荡形势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1867年，墨西哥自由

①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② 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26—27页。

③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④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富恩特斯认为，在盎格鲁清教文明与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对立的二元叙事下，美国作为“天选的国家、优越的民族”，自然地提出了改造世界的“美国方案”，承担起改造南方西班牙语美洲“劣等民族”的重任。

⑤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México y el Mundo: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Tomo I: México y 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90, p. 11.

⑥ José Fuentes Mares, *Juárez y los Estados Unidos*, México: Editorial Jus, 1964.

派战胜法国干预和帝国统治，开启了墨西哥历史上重建和巩固共和国的新阶段。<sup>①</sup> 在 1808—1867 年间，墨美关系中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国内美国外交史学者王立新认为，在 19 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国与国间的争斗主要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而 20 世纪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意识形态时代。<sup>②</sup> 不过，19 世纪的墨美关系表明，美国早在建国初期已开始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墨西哥自由派、挑动墨西哥派系内斗的手段，以推进其领土扩张的目标，只不过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更多体现了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一面。本文认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sup>③</sup>可以更好地解释 19 世纪的墨美关系，即追求国家利益和安全才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驱动力。因此，在墨西哥国家建设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底色是扩张主义和门罗主义。

## 二 墨美边界冲突的缘起

墨美领土冲突作为 19 世纪墨美关系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并非仅是得克萨斯独立、墨美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仅是墨美两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墨美争端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国正式建国之前，那时的北美土地上有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这几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16 世纪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在北美和中美洲除巴拿马以外的地区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其核心区域是如今的墨西哥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美国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到了 17 世纪末，法国人沿密西西比河溯流而上，抵达墨西哥湾，征服了新奥尔良，宣称拥有路易斯安那。而英国除了拥有北美东岸的 13 个殖民地之外，还曾借助海盗的力量渗透加勒比海岛屿和中美洲的部分地区。1713 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英国如愿以偿地突破了西班牙的屏障，控制了美洲部分站点以推动利益丰厚的热带产品和奴隶贸易。此外，英国政府为了垄断北美的皮毛生意，禁止北美 13 个殖民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

<sup>①</sup> Paulo Riguzzi,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2010)*. Volumen 5: *Europa*,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 32.

<sup>②</sup> 王立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 页。

<sup>③</sup> 根据王立新的学术史梳理，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和列维（Werner Levi）认为，国际政治中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是最根本的驱动力，而意识形态是这种追求的辩护工具，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

以西扩张。可以说,18世纪中期之前的北美局势是欧洲殖民帝国全球性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56—1763年,经历了英法七年战争的洗牌,北美局势出现了重大改变,法国在北美遭到严重削弱,而英国因连年战争财政吃紧,对北美各殖民地加征重税,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直至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至此,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成为北美大陆上的新势力。

相比墨西哥,美国的建国历程相对顺利。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中得到了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不同程度的支持。而且,宗主国英国战败后很快就跟美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承认了美国独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墨西哥的独立战争(1810—1821年)历时11年,并且直到1836年才得到西班牙的承认,期间又耗费了十多年。此前,在国弱民疲、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还遭受了前宗主国多年“再征服”战争的侵扰。墨美两国截然不同的独立历程极大地拉开了双方在争夺领土战争中的实力差距。墨西哥自由派学者阿尔卡拉兹(Ramón Alcaraz)在《墨美战争史札记》一书中考察了墨美冲突缘起问题,他认为,“这个共和国(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它注定要在哥伦布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sup>①</sup>。独立之后的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束缚,有了新的目标,它要“将美洲大陆作为其历史努力的自然领域,以及获取新的领土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为其提供生计”<sup>②</sup>。也就是说,它不甘再做依赖英国重商政策的海洋国家,而是力图发展为一个大陆共和国。因此,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等现实利益的刺激下,一种有利于美国领土扩张、确保国家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sup>③</sup>

富恩特斯的《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一书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意识形态。据他考察,美国侵略精神早在“天定命运”这一概念提出前就已发挥作用,它就像语言和宗教一样自发地植根于人民之中。<sup>④</sup>在加尔文清教价值观的主导下,美国人深信世界上的人分为“被选中的人”和“被诅咒的人”。<sup>⑤</sup>上帝的

<sup>①</sup> Ramón Alcaraz,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tre México y Estados Unidos*. Tipografía de Manuel Payno, 1848, México: Editora Nacional, S. A., 1952, p. 2.

<sup>②</sup>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p. 33.

<sup>③</sup>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 38.

<sup>④</sup>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p. 33.

<sup>⑤</sup>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México y el Mundo.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Tomo I: México y 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90, p. 11.

恩典将会降临在那些被选中的、受到“召唤”的人身上，而检验是否得到上帝恩典的依据便是在今世是否获得世俗世界中的成功。富恩特斯认为，从这一点来看，清教徒就能比天主教徒更好地应对现代扩张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世界的要求<sup>①</sup>，这一观点基本承袭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sup>②</sup>。富恩特斯分析指出，美国人从受到上帝召唤中确认了自身的优越性与模范性，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一群善良高尚的人，将不止于无用的道德自恋，而是忠诚于并积极响应上帝的召唤，将优越的“美国模式”传播到其他地区，承担起复兴世界的重任。<sup>③</sup>面对美国扩张途中的重要障碍西班牙，美国提出了对抗西班牙君主主义和天主教教义的“美国方案”，美国式的自由将最终解放笼罩在阴影下的西语美洲。

美国建国初期的国父们在领土和外交问题上的思考与实践也在不断发展这种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在托马斯·杰斐逊看来，美国文明要高于欧洲文明，因为“欧洲的光鲜社会有着人为的社会分层、对人的自由进行压迫性限制以及沉重的债务和税收负担”<sup>④</sup>，而美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美国的目标在于保持和捍卫自由。在这一逻辑之下，杰斐逊认为，“为了保持共和制的政府，美国需要扩张大量的土地来保证个人机会均等、自治与良好的公共道德”<sup>⑤</sup>。此番理念在后来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假说”<sup>⑥</sup>中获得进一步发展。杰斐逊还认为，美国不仅要保护本国的自由体制，而且要在南方邻居面前树立自由的楷模。他在1813年写信给科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有责任将拉美人“提升”到适当水平的态度，“新西班牙与美国的邻近以及随之而来的交往，可能意味着为其上层阶级

①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p. 57.

② [美] 马克斯·韦伯著，闫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韦伯在本书中提出，新教伦理为新教徒提供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驱动力和道德感，从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 José Fuentes Mares, *Génesis d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Grijalbo, 1986, p. 58.

④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2, 1990, p. 136.

⑤ 王立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⑥ Frederick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aper rea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Chicago, July 12, 1893; 董经胜：《特纳的“边疆假说”与拉丁美洲的边疆史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6期。“边疆假说”由特纳在1893年提出。根据该假说，西进运动中“自由土地”的不断推进塑造了美国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因为它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也是化解社会压力的“安全阀”。不断扩展的边疆促进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民主化。

提供学校，为下层阶级提供榜样。”<sup>①</sup>此外，汉密尔顿和伯尔等美国政治家都曾表示希望将南方邻居从西班牙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后者甚至曾经在1805年组织过征服墨西哥并在当地建立独立政府的行动。1823年，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会演讲中阐述了“门罗主义”，即欧洲不应再插足美洲的事务。至此，这一外交原则与乔治·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讲辞所奠定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sup>②</sup>一同构成了美国19世纪外交主基调。在这一外交思想主导下，约翰·昆西·亚当斯主张美国应当进行领土扩张，直至占领整个北美，美国应当成为北美以外的“自由灯塔”，成为所有积极争取自由的斗士的榜样。<sup>③</sup>上述外交思想的意图在于在西半球排除欧洲势力干扰之后，美国将在这个新大陆进行领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扩张。具体到墨美关系上，当墨西哥于1821年独立之时，美国不仅已经成长为羽翼丰满的一方强国，而且它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也已酝酿了近半个世纪。作为毗邻美国的南方邻居，墨西哥将首当其冲。

当西属美洲爆发独立运动后，在西班牙帝国失去美洲主权之时，美国布局扩张主义事业迎来了大好时机。在此期间，新西班牙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起义者们与美国官方展开了早期互动。美国政府积极派遣代表前往西属美洲的起义地区。美国商人沙勒（William Shaler）接受派遣前往新西班牙。波因塞特（Joel Poinsett）作为驻南美的领事被派往智利，为当地起义者提供必要的帮助，他后来成为美国驻墨西哥共和国首任大使。<sup>④</sup>与此同时，墨西哥起义派也曾多次试图向美国寻求援助。沃德（Robert J. Ward）在其研究中总结了墨西哥起义军几次联系美国的尝试。最初，起义军将领伊达尔戈委任危地马拉人德莱托纳作为起义军的首位特使赶赴美国，然而，这位特使还未离开新西班牙就被保皇派逮捕。在伊达尔戈和阿连德死后，墨西哥起义军至少4次试图获取美国援助，其中拉永（Ignacio Rayón）和马里亚（José María Morelos）各发起两次。<sup>⑤</sup>然而，他们与美国高层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联系并没

<sup>①</sup> Robert J. Ward, “Los Estados Unidos y sus Intereses en las Colonias Españolas: La Nueva España”, en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de México*, Vol. 4, 1972, p. 70.

<sup>②</sup> 华盛顿在演讲中强调了长期性结盟的危险性，他认为美国应避免与外国建立长期的友好或敌对关系。他还认为美国应当利用地理优势，避免卷入欧洲的事务中。

<sup>③</sup> [美] 孔华润（沃伦·I. 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sup>④</sup>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 48.

<sup>⑤</sup> Robert J. Ward, “Los Estados Unidos y sus Intereses en las Colonias Españolas (la Nueva España)”, en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de México*, Vol. 4, 1972, p. 90.

能促成双方的合作，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要求墨西哥制定一部与美国相同的宪法，如此解放的省份就可以加入美国，而墨西哥代表并不愿意以并入美国为代价获取援助。由此可见，美国对墨西哥的扩张野心早在19世纪初就昭然若揭。在墨西哥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多次采取上述“以领土换保护”的招数来对待本就陷入困境的墨西哥政府。在与美国打交道的岁月里，如何在获取援助的同时不丧失领土主权，成为墨西哥历届自由派政府不得不考量的难题。

### 三 从得克萨斯问题到墨美战争

早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爆发前，美国就已开展了扩张运动。1803年，美国政府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亚当斯—欧尼斯条约》（El Tratado Adams - Onís）。根据该条约，西班牙将东佛罗里达和西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并划定了美国和西班牙帝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界限。然而，1821年墨西哥正式独立这一事件使得该条约无法在西班牙官方层面获得实施。为了重新划定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美国政府需要正式开启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然而，独立后的墨西哥在保皇派精英的主导下，计划采用由西班牙王室成员加冕为皇帝的君主制，以期获得前宗主国的承认。在西班牙拒绝承认墨西哥之后，保皇派将领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称帝，向美国寻求外交支持。1822年9月25日，伊图尔维德任命曼努埃尔（José Manuel Zozaya）为首任驻美国代表。然而，美国却迟迟不愿向墨西哥派出代表。根据埃雷拉的看法，美国政府推迟与墨西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因为新独立的墨西哥采用了君主制，这不符合美国将共和模式推广到全美洲的愿望。在美国高层看来，共和模式将成为制衡欧洲列强的强大力量。<sup>①</sup>直到1825年，在墨西哥建立联邦共和体制之后，美国才紧随英国之后，向墨西哥派遣波因塞特作为第一任全权公使。这也代表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关系中的第一次摩擦出现在得克萨斯问题上。墨美建立关系不久，波因塞特就向维多利亚政府提出了边界问题，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有获得得克萨斯领土的兴趣。当时墨西哥的外交部长阿拉曼认为1819年《亚当斯—欧尼

<sup>①</sup>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 55.

斯条约》划定的边界依然有效，因此边界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sup>①</sup> 1829年8月25日，波因塞特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墨西哥政府提出用500万美元购买得克萨斯领土。该提议遭到了墨西哥政府的拒绝。1830年1月28日，巴特勒（Anthony Butler）接替波因塞特成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作为一名商人，他曾投资得克萨斯的土地，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提出购买墨西哥的领土。面对美国政府多次要购买得克萨斯的提议，墨西哥政府的态度始终是拒绝的。事实上，直到得克萨斯独立多年后、被美国吞并之时，墨西哥政府都不愿放弃对得克萨斯的主权要求。墨西哥政府对这块领土的强硬态度与美国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相悖，最终两国领土纠纷以最极端的战争方式获得解决。

在当时的墨西哥政治家眼中，虽然墨西哥共和国继承了原新西班牙总督区的大片领土，但此时的墨西哥领土早已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统治之下可以随便割让的殖民地了。即便墨西哥独立初期国库空虚，经济衰退，但各届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鲜有让步。因此，当美国期望采取以利益交换领土的方式来攫取墨西哥领土时，自然免不了碰壁。最终，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墨美战争粗暴地解决了问题。然而，战争之外，美国的官方和民间也以各自的方式隐秘地推动着美国的扩张主义进程。得克萨斯问题依然是最典型的案例。

虽然对美国的扩张意图心知肚明，但墨西哥政府还是允许源源不断的美国移民来得克萨斯定居。其中的缘由包括得克萨斯人烟稀少，且当地时常遭受北方边境一带的土著人科曼奇人（comanche）劫掠。在连年战乱、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墨西哥人口增长缓慢，仅依靠本国移民来稳定边疆地区的方案也不太可行。总之，作为脆弱的边疆地区，墨西哥政府一开始并未阻止美国移民大量涌入得克萨斯。不久之后，多方面的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行政区划的问题。墨西哥共和国初期，得克萨斯并入科阿韦拉州，然而，得克萨斯代表希望得克萨斯成为独立州或地区。<sup>②</sup> 因此，得克萨斯与科阿韦拉州政府之间龃龉不断，得克萨斯自治倾向严重。其次是奴隶制问题。早在1814年，起义军将领莫雷洛斯在独立运动时期就曾主张废除奴隶制。1824年，墨西哥共和国成立后，禁止了奴隶贸易。当时，得克萨斯议员提议授予得克萨斯地区

<sup>①</sup>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coord.), *México y el Mundo.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Tomo I: México y 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90, pp. 46-47.

<sup>②</sup> 根据墨西哥1824年宪法，“地区”（territorio）是当时的一种地方行政单元，与州级行政区同级。

引进奴隶一年的宽限期，但这一提议几乎被一致否决。<sup>①</sup>至此，墨西哥政府的废奴法令与来自美国南部移民的保护奴隶财产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冲突。此外，墨西哥 1824 年宪法确立天主教为墨西哥唯一官方宗教，这一宗教不宽容政策在清教徒占多数人口的得克萨斯地区引发了不满。在上述诸多问题的共同作用下，得克萨斯的分裂势力不断壮大。直到 1830 年，以布斯塔曼特和阿拉曼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平定地方分裂势力的法令。1830 年 4 月 6 日，外交部长阿拉曼出台一部殖民法，限制美国移民进入得克萨斯，以消除当地政治分离的愿望。1835 年，墨西哥国会开启了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改革工作，而得克萨斯分裂势力则以捍卫联邦制为口号展开了针对中央政府的反叛运动。而此时的美国总统杰克逊表面上秉持中立态度，暗地里则在招兵买马，支持得克萨斯分裂运动。

另外，墨西哥自由派内部的理念冲突也同得克萨斯的自治争议交织在一起，在得克萨斯分裂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墨西哥激进自由派和联邦主义者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在得克萨斯与中央政府的冲突中，选择站在得克萨斯一边。1835 年，萨瓦拉离开位于巴黎的墨西哥驻法大使馆，奔赴得克萨斯，在当地的移民者大会上发表讲话，支持叛乱。1836 年 3 月，得克萨斯宣布独立后，人们选举萨瓦拉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副总统。萨瓦拉出身于墨西哥南部尤卡坦半岛，曾参加过 1824 年墨西哥制宪会议，也曾担任过墨西哥州州长。他的叛国行为或许可以从他组织并参与约克礼式会（ritos de York）的经历中得到解释。<sup>②</sup>在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大使波因塞特在墨西哥创立新的约克礼式会，吸引了不少崇拜美国的激进自由派。波因塞特借此打击墨西哥国内亲西班牙的苏格兰礼式会（logias escocesas）。萨瓦拉就是当时墨西哥“美国帮”的领袖。在约克礼式会所宣扬的“美国模式”意识形态影响下，萨瓦拉选择背叛墨西哥国家利益，以“自由”的名义将得克萨斯拱手让给美国。此处，萨瓦拉政治理想中的“自由”正是后来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就职演讲中所宣扬的“我们的宪法实现和保障了的自

<sup>①</sup>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coord.), *México y el Mundo.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Tomo I: México y el Expansionismo Norteamericano*,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90, pp. 56 - 57.

<sup>②</sup> Alfonso Toro, *Dos Constituyentes del Año de 1824. Biografías de Don Miguel Ramos Arizpe y Don Lorenzo Zavala*, México: Talleres Gráficos del Museo Nacional de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Etnografía, 1925, p. 108.

由”<sup>①</sup>，而非起义军先辈在废奴事业上取得的自由成果。在现实中，并入美国的得克萨斯与美国南方州一同享受的是蓄奴的“自由”和保卫奴隶财产的“自由”。不过，并非所有联邦主义者和约克礼式会成员都支持得克萨斯的分裂。作为约克礼式会创立者之一，阿里兹佩（Ramos Arizpe）曾提出从科阿韦拉向得克萨斯移民的方案来巩固得克萨斯的边疆地区，以维护领土完整。<sup>②</sup> 萨瓦拉这一特殊案例或许可以说明，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波因塞特在墨西哥期间虽然没能与墨西哥政府达成购买领土的合作，但是他却以一种隐秘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动了美国的扩张进程。萨瓦拉这样受影响的墨西哥自由派会心甘情愿为了追求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而背叛祖国。此外，波因塞特蓄意煽动墨西哥党派分裂的行为，也破坏了这个年轻共和国内部的政治秩序。

得克萨斯问题不仅加剧了墨西哥的地方动荡，也对美国国内局势产生了影响。得克萨斯宣布独立之后，多次要求并入美国。关于是否吞并得克萨斯这一问题引发了美国国内南方蓄奴州和北方废奴州之间的斗争。杰克逊总统不得不推迟承认独立的得克萨斯，但他还是在任职结束前夕签署了承认得克萨斯为独立国家的决议。不过，美国的扩张运动不会就此中断或搁置。为了平衡南方州和北方州的利益，美国政客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吞并某块土地，而是如何在向南和向北两条扩张路径上保持相对一致的步调。18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为争取南方州和北方州的选票而喊出竞选口号“‘重新吞并’得克萨斯和‘重新占领’俄勒冈”，1845年2月28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对得克萨斯的吞并，1846年6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与英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占领了俄勒冈。正是在美国扩张进程最狂热的这几年，渐趋成熟的扩张主义理论也获得了极具宗教色彩的概括“天定命运”<sup>③</sup>。在美国国内支持波尔

<sup>①</sup> “La Anexión de Texas a los Estados Unidos”, en Luis Cabrera (traducción y edición), *Diario del Presidente Polk*, 2 v., México: Editorial Herrero, 1949, II, p. 6.

<sup>②</sup> Alfonso Toro, *Dos Constituyentes del Año de 1824. Biografías de Don Miguel Ramos Arizpe y Don Lorenzo Zavala*, México: Talleres Gráficos del Museo Nacional de Arqueología, Historia y Etnografía, 1925, p. 52.

<sup>③</sup> David Guerrero Flores y Emma Paula Ruiz Ham, *El País en Formación. Cronología (1821-1854)*, Mé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 las Revoluciones de México, 2012, pp. 212-213. “天定命运”的概念由美国记者奥沙利文（John Louis O’ Sullivan）于1845年12月27日在《纽约晨报》（*New York Morning News*）上提出，用以概括美国扩张主义理论。在奥沙利文看来，美国人在北美大陆的扩张是天意使然，这使得每年成倍增加的数百万居民得以自由发展。“天定命运”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時候，当时加尔文教派呼吁殖民地人民在美洲土地上实现神圣计划。对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来说，吞并得克萨斯、占领俄勒冈以及征服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克发动战争的人看来，扩张政策与自由并不冲突，相反，一个强大的美国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促进自由。<sup>①</sup>

如果说 1846—1848 年的墨美战争对于美国而言是遵从“天命”，那么对于墨西哥来说无疑是遭了“天谴”。1846 年 5 月 12 日，美国波尔克总统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向墨西哥宣战。两个月后，在国内局势尚未平定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宣布了与美国的交战状态。在接下来的数月内，美军从墨西哥北境、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三路进发，攻打墨西哥。由于战术和武器上的劣势，墨军节节败退。1847 年 9 月，美军攻下了墨西哥城，在国家宫升起了美国国旗。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军占领墨城的那个圣诞节，墨城的一群激进自由主义者在美军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特别市议会，取代被美军解散的市议会，并向首都和墨西哥州人民征税以满足美军将领斯科特（Winfield Scott）的军费要求。<sup>②</sup> 1848 年 2 月 2 日，双方政府代表签订了终止战争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根据该条约，两国重新划定了边界，墨西哥割让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给美国<sup>③</sup>，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毫无疑问，墨美战争给墨西哥共和国带来的影响不仅是领土疆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战后的墨西哥国内弥漫着对本国宪政体制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幻灭。阿尔卡拉斯在他 1848 年出版的《墨美战争史札记》中写道：“战争结束了，留给我们的的是对无秩序、无希望、无政府所致罪恶的悲哀，考验、保卫和拯救人民的日子将变得愈加艰难。”<sup>④</sup> 美国学者黑尔（Charles A. Hale）认为，墨美战争加剧了墨西哥人的思想危机。战争结束后，墨西哥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主张按照各自的经典方案对墨西哥进行彻底改革：保守派彻底走向君主主义道路，不惜向欧洲君主国寻求干预和保护；而自由派则在之前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上更进一步，以推进国家世俗化进程。这也预示了墨西哥随后 20 年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1856 年的自由主义大改革和 1864 年成立的马

① 王立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18 页。

② David Guerrero Flores y Emma Paula Ruiz Ham, *El País en Formación. Cronología (1821-1854)*, Mé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 las Revoluciones de México, 2012, pp. 245-246.

③ *Tratado de Paz, Amistad y Límites entre la República Mexicana y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mayo 30, 1848.

④ Ramón Alcaraz,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tre México y Estados Unidos*, Tipografía de Manuel Payno, 1848, México: Editora Nacional, S. A., 1952, p. 402.

克西米利安帝国的命运。<sup>①</sup>

#### 四 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的合作

墨美关系中并非只有冲突，也存在合作。受意识形态亲缘性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美合作主要发生在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之间，而墨西哥保守派倾向于与欧洲国家加强联系。1867年之前的墨西哥自由主义和自由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810年起以伊达尔戈、莫雷洛斯为代表的起义军将领发起了独立运动，并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法令；1833—1834年，法里亚斯和萨瓦拉等激进自由派开展了针对教产和教会垄断教育问题的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1855—1860年，以胡亚雷斯、莱尔多、奥坎波为代表的自由派开启了推动国家世俗化进程的第二次自由主义改革；1864—1865年，墨西哥第二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了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法令。除了马克西米利安政权是在墨西哥保守派的拥护和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的，前三个阶段的自由派都曾与美国建立不同程度的联系。不难理解，独立运动中的起义军以及之后墨西哥自由派的政治理念都与美国所宣扬的自由体制和价值观相契合，因此他们也倾向于在与欧美列强周旋的战场上寻求美国的支援和保护。相反，墨西哥本土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则倾向于争取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支持，来阻止美国扩张。上文已经提及了起义军曾多次试图联系美国政府，以期获得美国援助，不过，双方并未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直到墨西哥共和国时期，在1825年墨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墨西哥自由派才与美国逐渐建立起互相利用的合作关系。对于墨西哥自由派来说，美国是政治避难所，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模范，也是夺取国内政权和抗击欧洲列强入侵的盟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墨西哥自由派是美国模式的崇拜者和效仿者，是实现其领土、经济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工具。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了少数极端案例，墨西哥自由派政权并不会轻易地在领土和国家主权上让步。此外，墨美战争也使墨西哥自由派看清了两国关系更现实的层面，相比过去更加提防美国扩张的野心。因此，对于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自由派来说，如何在争取美国援助的同时尽可能地不损害墨西哥国家主权和利益，

<sup>①</sup> Charles A. Hale,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isis in Mexican Thought", in *The Americas*, Vol. 14, No. 2, October 1957, pp. 153 - 173.

成为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重大难题之一。

对于美国来说，墨美战争之后的一个重要转向是经济扩张，对墨西哥的扩张进程并未终止。根据马塞拉的研究，1847年墨美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市场，并因此与英法等国就开发贸易线路和控制跨洋航线展开竞争。<sup>①</sup>因此，吞并拉梅西亚（La Mesilla）地区、占领下加利福尼亚以及控制特万特佩克地峡成为美国向墨西哥扩张的新一轮目标。由于美国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南线计划通过索诺拉州和奇瓦瓦州北部的拉梅西亚山谷，因此该地区成为两国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后尚存争议的领土。不久，美方以购买的方式轻松地获得了这块领土。1853年12月，墨美双方签订了《拉梅西亚条约》，时任墨西哥总统圣安纳将拉梅西亚地区以1000万比索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此举立即被墨西哥民众定义为卖国行为，圣安纳也继1836年签定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后第二次成为叛徒。“《拉梅西亚条约》最初被圣安纳视作寻求资金的来源，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贪欲，也是为了实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sup>②</sup>墨西哥举国上下发起了反对圣安纳独裁政权的运动。1854年的《阿尤特拉计划》（Plan de Ayutla）<sup>③</sup>特别列举圣安纳出卖领土的罪行作为讨伐依据。圣安纳最后一届独裁政权就此终结，他本人也被驱逐出境。圣安纳独裁时代终结后，墨西哥温和自由派开始在政坛占据重要位置，开启了19世纪墨西哥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自由主义大改革（1855—1860年）。这场致力于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个领域清除殖民残余并推进国家世俗化的改革，大大激化了自由派政府与天主教会和军队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经过改革战争、抵抗法国入侵和推翻马克西米利安帝国的一系列抗争后，自由派政府最终保住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果实，并将自由主义发展为墨西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援。

三年内战期间，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都积极向欧美寻求支援和保护。1857年年底，保守派苏洛阿加（Félix Zuloaga）发动政变，宣布了旨在反对1857年自由主义宪法的塔库巴亚计划（Plan de Tacubaya）。至此，改革战争打响，墨西哥出现了两个政府。为了打赢战争，据守瓜纳华托（后来搬到韦

<sup>①②</sup> María Marcela Terrazas y Basante, *Inversiones, Especulación y Diplomacia, las Relaciones entre México y los Estados Unidos durante la Dictadura Santanista*, Mé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2000, p. 12, pp. 272-273.

<sup>③</sup> “Plan de Ayutla, Marzo 1, 1854”, en *Planes de la Nación Mexicana, Libro Cinco: 1855-1856*,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1987, pp. 228-229.

拉克鲁斯)的胡亚雷斯政府向美国寻求保护;而占领墨城的保守派政府寻求支援的对象则首先是西班牙和法国等天主教国家,其次是英国。苏洛阿加派遣阿尔蒙特(Juan Almonte)为保守派政府代表前往西班牙。1859年9月26日,阿尔蒙特与西班牙全权代表在巴黎签署条约,同意西班牙提出的偿债和赔偿等要求作为获取外交承认的条件。与之相对应,胡亚雷斯派遣马利亚(José María Mata)作为自由派政府全权公使前往美国,寻求承认和援助。为了评估局势并权衡是否应该全面支持胡亚雷斯政府,美国曾派遣秘密特工威廉·丘奇韦尔(William Churchwell)前往墨西哥考察。丘奇韦尔考察发现,没有外部势力干预,墨西哥的交战双方都无法存续下去。而且,他也察觉到自由派政府愿意在领土特权上进行谈判。<sup>①</sup>由此,鉴于墨西哥保守派旗帜鲜明地向欧洲势力寻求保护,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扶植自由派,以此抗衡欧洲势力的威胁。然而,美国政府并不会浪费每一个推进扩张进程的时机。作为支援的条件,美国也为自由派政府开出了一份清单:下加利福尼亚领土和特万特佩克地峡的通行特权。

虽然胶着的内战局势令胡亚雷斯急需获得美方的支援,但是他也清晰地意识到“出售下加利福尼亚远不能保证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sup>②</sup>,出售拉梅西亚的圣安纳总统就是前车之鉴。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公使麦克莱恩(Robert McLane)谈判期间,胡亚雷斯政府外交部长奥坎波始终回避出售领土的问题。为了转移视线,奥坎波在过境权上做了明确界定,还向麦克莱恩提出了一个涉及安全和秩序的互助同盟项目<sup>③</sup>,名为《墨美攻守同盟条约》<sup>④</sup>。奥坎波这一提议的初衷是为了联合美国共同抵御欧洲的侵扰,然而,麦克莱恩拒绝缔结该条约。按照富恩特斯的说法,“面对胡亚雷斯以回避和拖延为伎俩的抵抗(我们墨西哥人在这方面是天才),麦克莱恩最终放弃了。他向自己的政府要求授权放弃下加利福尼亚,以换取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无论是否征得墨西哥政府同意都拥有军事保护特万特佩克通道的权力。他还提议将资金补偿减少到400万美元”<sup>⑤</sup>。1859年12月,墨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签署了《麦克莱恩—

<sup>①</sup>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 135.

<sup>②</sup> José Fuentes Mares, *Juárez y los Estados Unidos*, México: Editorial Jus, S. A., 1964, p. 111.

<sup>③</sup> Octavio Herrera y Arturo Santa Cruz,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México (1821 - 2010). Volumen I: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2011, pp. 136 - 137.

<sup>④⑤</sup> José Fuentes Mares, *Juárez y los Estados Unidos*, México: Editorial Jus, S. A., 1964, p. 119, p. 124.

奥坎波条约》，条约规定墨西哥给予美国军队特万特佩克地峡的永久通行特权；美国将为自由派政府提供 400 万美元的补偿，不过这笔资金将会预留一半作为美国公民在墨损失的赔偿。虽然胡亚雷斯政府实际上仅获得了 200 万美元的资金，但在不割让领土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已是来之不易的谈判胜利。虽然 1860 年 5 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批准《麦克莱恩—奥坎波条约》，但在国会做出最终决定的两个月前，美国军方已经开始了支援墨西哥自由派政府的行动。1860 年 3 月，美国军舰对韦拉克鲁斯的利扎多（Antón Lizardo）锚区进行干预，以逮捕海盗为名，扣押了保守派的两艘军舰并将其拖往新奥尔良。<sup>①</sup> 这一干预使保守派在韦拉克鲁斯登陆的计划失败。最终，在美国的援助下，胡亚雷斯政府赢得了内战，保卫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

事实上，法国入侵墨西哥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看准了美国因内战自顾不暇，暂时无法向胡亚雷斯政府施以援手的窘境。因此，法国得以在墨西哥保守派的协助下，扶植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第二帝国皇帝。对于墨西哥的事态，美国总统林肯宣布保持中立态度，并禁止对墨武器出口。不过，林肯和继任的约翰逊总统都明确拒绝承认马克西米利安帝国。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腾出手来，开始以武器支援和外交声援等方式来支持墨西哥的自由共和派政府。1865 年 11 月，美国向格兰德河对岸的自由派游击队走私武器。1866 年 5 月，美国驻维也纳公使抗议在奥地利招募前往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服役的志愿军。在 1858—1867 年这十年间，墨西哥的自由主义改革事业遭遇了严峻考验。在富恩特斯看来，没有美国的援助，自由派将不可能取得胜利，墨西哥的历史也将改写。<sup>②</sup>

## 五 余论

正如阿尔卡拉斯所言，“墨西哥共和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充满了组成一个伟大而幸福国家的各种因素。但它也有其不幸，包括与一个强大且野心勃勃的民族为邻”<sup>③</sup>。19 世纪美国的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攫取墨西哥

<sup>①</sup> Raúl González Lezama, *Reforma Libertad. Cronología (1854-1876)*, Mé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 las Revoluciones de México, 2012, p. 68.

<sup>②</sup> José Fuentes Mares, *Juárez y los Estados Unidos*, México: Editorial Jus, S. A., 1964, p. 120.

<sup>③</sup> Ramón Alcaraz,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tre México y Estados Unidos*, Tipografía de Manuel Payno, 1848, México: Editora Nacional, S. A., 1952, p. 2.

的领土。墨西哥政府捍卫从殖民时代所继承领土的行为本身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现代国家的基础组成要素包括领土、政权和人民。丢失领土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遭到破坏，而且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意味着倾覆的灾难。圣安纳出卖拉梅西亚一例即可说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反法战争中，墨西哥共和政府拒绝圣安纳想要披挂上场、抗击法国的多次请缨。这位曾经打退西班牙人<sup>①</sup>、抗击法军入侵<sup>②</sup>、远征得克萨斯和抵御美国入侵的将军，至死都没有摆脱叛徒的名号。这意味着在共和国早期，墨西哥人民就认为国家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领土问题上也是不可妥协的。

由此，从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视角出发，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富恩特斯曾针对两者之间的合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是依靠美国力量的自由派，为什么人们对萨瓦拉和胡亚雷斯的评价截然不同？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胡亚雷斯、奥坎波和莱尔多同19世纪30年代把得克萨斯献给美国的萨瓦拉一样，都是“波因塞特主义”的传人，一半是英雄，一半是叛徒。因为，他们期望通过美国人的刺刀来拯救墨西哥，正如萨瓦拉想让得克萨斯独立，以便将它变成一所“自由学校”。令人费解的是，墨西哥已有很多以胡亚雷斯命名的街道，却没有以萨瓦拉命名的街道。这种遗漏打破了历史事实的联系，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sup>③</sup>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胡亚雷斯和萨瓦拉相提并论？他们应该得到相似的历史评价吗？本文认为，应当将历史人物放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来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扩张进程上升的阶段，美国国内从官方到民间充斥着火热的扩张主义情绪，其中不乏吞并整个墨西哥的激进言论。如果墨西哥政坛大多是萨瓦拉那样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崇拜美国的理想主义者，甘愿拱手将领土让给美国，甚至愿意并入美国，那么墨西哥这个国家早就不复存在了。或许，在更夸张的历史假设下，为了平衡国内蓄奴州和废奴州的利益，美国还需要吞并一个加拿大来平衡吞并墨西哥的后果。然而，历史事实是美国对墨西哥的领土扩张进程最终止于《拉梅西亚条约》，这正是因为墨西哥主流拒绝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如果说萨瓦拉是一个无原则追求美国

<sup>①</sup> 此处指发生于1829年的西班牙入侵墨西哥的战争。当时圣安纳作为韦拉克鲁斯州的州长，率军抵抗西班牙军队的入侵。

<sup>②</sup> 此处指的是发生于1838—1839年间法国第一次入侵墨西哥的战争，也称“糕点战争”（Guerra de los pasteles）。圣安纳在抵御法军的战场上负伤，失去一条腿。

<sup>③</sup> José Fuentes Mares, *Juárez y los Estados Unidos*, México: Editorial Jus, S. A., 1964, p. 154.

模式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墨西哥大部分的自由派是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通过民族和国家利益来框定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自由主义。这正是胡亚雷斯与萨瓦拉的区别所在。以胡亚雷斯为代表的自由派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拒绝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并且，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下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夺取国内政权，抵抗欧洲势力的入侵。尽管在地峡通行权上的让步也会威胁到国家主权，但在艰难的谈判和利弊权衡之后，胡亚雷斯选择以较小的代价来换取抵御欧洲入侵、保卫自由主义改革成果和共和宪政体制等方面的更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的历史评价是公正的。胡亚雷斯无愧为墨西哥和西班牙语美洲共和国的英雄。<sup>①</sup>

19世纪的墨美关系也为我们理解20世纪乃至当今的美拉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由于地缘上的便利性，美国能够比欧洲列强更快地获得墨西哥国内事态信息，更频繁且有效地运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工具来获取墨西哥领土资源。19世纪美国“天定命运”和“自由灯塔”的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空泛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真实地影响了历史上的墨美关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但是美国官方推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适性的特点，期望将“美国模式”推广到整个西半球。而胡亚雷斯等墨西哥自由派所信奉的自由主义虽然在宪法内容上主要也是由自由宪政体制、保护公民权利、维护信仰自由等方面构成的，但从同样深远的意义来说，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信仰还在于摆脱外部强权的控制，维护共同体的独立和自治。这一自由理念内生于独立运动前后力图摆脱殖民母国的美洲人心中，并在此后数次反侵略战争中不断加强并糅合到源自欧美的自由主义话语当中，构成了19世纪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底色。这正是理解墨西哥自由派缘何对美国有所提防的关键，也让我们反思以单纯的意识形态标签来判断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做法是否可靠。正如霍华德·J. 威亚尔达所言，拉美与美国在文化和政治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sup>②</sup> 共用“自由”与“自由主义”等同一语汇确实反映了双方的观念交集，但是我们仍能辨识出两个不同观念传统

<sup>①</sup> 1865年5月1日，哥伦比亚国会授予贝尼托·胡亚雷斯“美洲英雄”称号；1867年5月11日，多米尼加国会也授予胡亚雷斯“美洲英雄”称号。

<sup>②</sup> [美] 霍华德·J. 威亚尔达著，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之间的张力。对于 19 世纪刚刚摆脱西班牙三百年殖民统治的拉美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抵抗外部强权的侵犯，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而美国在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进程从根本上与拉美国家的独立目标相抵触。综上所述，19 世纪墨美关系案例为理解美拉关系提供了一点启示：即使在同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的指涉下，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作为历史案例的 19 世纪墨西哥史与墨美关系也揭示了外部挑战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作用。作为独立不久、积贫积弱的新国家，来自美国的挑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墨西哥的国家建设进程。无论是以武力胁迫还是以金钱购买，抑或是以意识形态宣传来推进本国的利益，19 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对还处于国家建设早期阶段的墨西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干涉。19 世纪中叶爆发的墨美战争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墨西哥国家的形成。这一过程的推动不仅仅在于墨西哥中央政府为了应对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税收和人力资源，更大程度上在于墨西哥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和反思。战后，墨西哥国内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人士都愈发警惕美国扩张主义的影响。作为“他者”的美国的的外部冲击催生了墨西哥人的身份意识和民族认同，并推动了墨西哥人爱国情绪和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这一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在十多年后的反法战争中极大地激发了墨西哥人的卫国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几场堪称奇迹的对法战役的胜利。

因此，这一历史个案对当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当今国际环境中充斥着逆全球化、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不确定性等各种问题。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之下，当前中国也面临着外部因素的挑战。然而，越是经受外部因素的冲击，就越应当践行习总书记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综上所述，墨西哥早期国家建构的曲折发展作为历史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面对外部因素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当强化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如此才能促进自身持续稳定发展，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 徐 睿)